# 戈特哈德·京特

（Gotthard Günther，1900～1984）

1900 年，京特出生在原属德国的西里西亚地区。他在德国读完大学哲学课程，并曾在莱比锡大学任过助教。1940 年，他移居美国，讲授哲学课程，最终成为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电机工程系的生物学计算机逻辑学教授。他的基本哲学态度是用典型的美国控制论来对待哲学。他认为应当把逻辑学的哲学革新列入议事日程。他倡导一种多值逻辑，以对传统的形式与数理逻辑进行改造。他力求在现代科学与传统哲学之间进行新的沟通与对话。

# 美国之镜中的自述

本篇自述的作者(以下简称‘作者’)1900 年出生在巨人山脉西里西亚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这种背景对他以后的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牧师寓所有权被视为德国古典教育的殿堂，这一点众所周知。而一个在这个时代于德国东部出生的人有足够的机会汲取普鲁士精神，这一点也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个不到六岁的孩子踏进村办公立学校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受保守的普鲁士氛围的熏陶。词汇中所说的爱国主义，正像德国这个词一样，在青年时代只不过是一种模糊不清的形象，而普鲁士却是人们可以崇敬或憎恨的活灵活现的现实。作者一生都崇敬普鲁士观念，这大概是以后想要理解康德伦理学的深邃和弱点的人的必要前提。

他很小就与日常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他过去是、至今仍然是一位极为迟钝的学生，连村办公立学校的学习进度都跟不上。结果，其父很快就让他离开了那所学校，把他送到一所有不少邻村孩子就读的私立学校去准备人文中学的课程，因为该校似乎能为在人文中学就读创造更好的前提条件，并承诺因材施教、个别辅导。

在他大约十岁那年最终通过了希尔施贝格中学的入学考试之后，情况也没有好转。他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但对中学教学计划的进度更加不适应。他的老师说他懒，但在家里，他母亲想让他不去翻阅各类书籍，让他到院子里去玩都不太可能。在这位天生的理性主义者(他曾经是理性主义者)看来,那是无端地浪费时间,时至今日他始终讨厌各种玩耍乃至讨厌下棋。从孩提时代起他只有一种爱好,这种爱好他至今仍然钟情,而且上了年纪后更是酷爱。五

岁时他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副滑雪板。如果说即使在夏天，除了书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他的话，那么到了短暂的滑雪季节，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种爱好正符合他从孩提时代起所感受到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对雪景的钟爱，此外，他在滑雪时第一次以一种令他神往的方式经历了技术问题。这里书籍再次参与进来。他对滑雪板的构造以及对滑雪技术的兴趣极大，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差不多阅读了从 1910 年前后到最近几年出版的所有关于滑雪板的文字，无论是英文还是德文的，只要他能够得到。他这一生中所拥有的越野滑雪板、障碍滑雪板、顺坡滑雪板及跳远滑雪板的总数差不多可达 100 副。除了书籍以外，这是他愿意花钱的惟一一样东西。

有人可能会感到奇怪，一位学者的自述竟然花这么多笔墨来述说一种体育爱好。这里要事先声明一下，他的简历有大约 11 年的时间是记录他在美国科学院的经历。这一聘任得益于他写的那几篇论文。如果没有他对滑雪板构造和滑雪技术以及后来伴随而来的飞行技术的相当深入的了解（作者持有第 123 号滑翔机的国际驾驶证,后来在美国又获得了机动飞机驾驶证),他是绝对写不出那几篇论文来的。这开发了他对机械东西的理解力，这种理解力后来扩展到机械理论领域。

在我们关注他思想发展的时候，我们暂且还是回到他的中学阶段，尽管他在中学阶段是个糟糕的学生。他在五年级快结束时就已经懂得了古典文化在精神方面对于当代所具有的根本意义，尤其明白了古典文化是学者存在的绝对必要的前提。在以后的生命岁月里,他更是充满了这种信念。在那个时候他就下定决心,将来要当个学者而不做别的，尽管他的兴趣在历史和系统之间来回不停地频繁变动着。这时他在他父亲丰富的藏书中发现了一本

书,这本书助了他一臂之力,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神学家卡尔·海姆(Heim)于 1904 年在柏林出版的书:《未来的世界图像》,副标题为《哲学、自然科学与神学的论争》。这部著作从一个令当时的青年读者极其惊讶的命题,即哲学史至今已终结开始。哲学思想植根于反思的主体对世界的放弃,它导致了主观主义的极度发展。在主观主义中,所有今天以此为基础可能提到的问题均已被提出,而且在迄今为止的哲学史范围内,所有完全有可能的答案均已给出。当时,这位即将升入六年级的学生在第 7 页上读到:"当人们对一个问题所给出的所有答案都同样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时,人们能够选择的摆脱这一困境的道路只有一条。人们可以对导致如此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的那个问题本身进行考查。结果可能证明问题本身是虚假的,或该问题所依据的前提是虚假的。那样的话,人们试图对该问题所作的一切解答均毫无意义就不足为怪了。"

在这位文科中学的学生真正接触到哲学史之前,他已经从卡尔·海姆那儿了解到:哲学意味着人的歧途,意味着人的意识本身关进了其主体性的"自我牢笼",那个"虚假"的问题就出自人的主体性。带着一种他本人暂且也无法解释清楚的矛盾心理,他又往下阅读了十页:"今后一千年里,当人类成熟得不再需要哲学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把现在被我们当做人类深奥的思想史来钦佩的关于人的精神的自我封闭和再解放的奇特历史说成是不可置信的童话。"简而言之,卡尔·海姆认为,当哲学论证其自身是荒谬的之后,神学将再次替代哲学!

这位读者感受到的这种矛盾性来源于两种明显相互对立的、然而被他仅仅是感觉到了的观点,这两种观点的协调对他来说是几十年之后的事了。一种本能的理解就是,确信无论是今天还是

今后一千年中，哲学的终结都完全是无稽之谈。① 另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很快增强为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迄今人们所接触到的哲学实际上使用了“虚假”的提问方式在进行工作，这种提问方式导致迄今为止一无所获（？）。这位青年读者的印象是，该书的基本原理中有些东西十分正确，而另一些则极端错误，直到读完这本出色的著作的最后一页，他还是这个印象。但在当时，他还没有预料到，正是这个印象使他发现了他以后毕生工作的指路明灯。它的结果怎样？现在可以用最短的文字描述如下：古典逻辑学作为哲学基础在结构上（形态语法上）（morphogrammatisch）是不完备的。其哲学可能性已耗尽。因此，建立在古典逻辑学基础之上的哲学时代不可避免地肯定会提前结束，就这一点而言，海姆是对的。但当他把一个哲学时代的消失完全等同于哲学的终结时，他肯定会遭到反驳。然而，这样一种思想与正在到来的20世纪那种世纪末（fin-de-siècle）气氛非常接近。的确，1917年出版了一本提出此种观点的最深刻的著作，即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所著的名为《西方的没落》一书的第一卷。在稍后出版的著作中，斯本格勒本人将这本书的结论概括如下：“浮士德式的西欧文化可能不是最终的文化，但肯定是所有文化中最强有力的、最富激情的文化，由于它广泛的思想性与内心的最深层的矛盾之间的内在对立，它也是最悲观的文化。有可能在下个世纪，在地处魏克瑟尔河（维斯瓦河）（Weichsel）和阿穆尔河（黑龙江）（Amur）之间的平原的某个地方克瑟还会出现一个柔弱的后来者。但是这里自然与人——由于其历史的存在而与自然相对立——的

①不言而喻，这种表述不是出自作者的中学时代。它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

斗争实际上已经结束。”①

斯本格勒的这部著作是作者在其中学时代的最后几年里读到的第二部哲学巨著。而这次的印象更深刻，更具有魅力。然而相互矛盾的心情再次向他袭来，就像在读海姆的著作时那样。他感到他在这里遇到的既是某种无可辩驳的真实，同时又是某种含有很多误解的东西。他认为，直到现在，即他工作一生的最后时刻，他才找到了答案：对斯本格勒而言，人的存在所达到的那些高级文明是最高级别的形而上学的偶然事件。“……以伟大的文明形式演进着的较高级的人类历史是一种偶然事件，在 1000 年时西欧出现的其中一种伟大文明也是偶然事件。”② 但是这些偶然事件中的每一种偶然事件经过相对短暂的存在之后又消失了，人的存在又倒回到原始文明阶段。人由于“疲劳、闷闷不乐和冷淡，已失去了存在的兴趣，而渴望从千年的光明重新回到具有原始灵魂的神秘主义的黑暗中去，回到母腹中去，回到坟墓中去。”③ 这种类似于海姆的哲学终结的回归似乎具有必然性，因为正如斯本格勒所认为的那样，这种高级文明本身并非必然来自原始灵魂。因此斯本格勒不可能认识到，他的高级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一种向第三种更高级别历史范畴的过渡和继续。根据这样一种观点，一种并非以斯本格勒为代表的观点，所谓的地区高级文明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原始灵魂的清除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原始灵魂终结了，而这时人也从原始灵魂中解脱出来，因此与历史上先前的那

① 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人与技术》，慕尼黑，1931 年，第 63 页。

② 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西方的没落》，慕尼黑，1923 年，第 1 卷，第 188 页。

③ 同上书，第 144 页。

种状态有了联系,同时这种联系也获得了一种保证,即灵魂不能再回归到远古历史的母系基础，而是不可抗拒地走上一条向前发展的道路。

然而作者在其青年时代还没有产生这些至今令他全神贯注的想法。他只带着一种不愉快的精神和对他周围的思考习惯越来越重的怀疑进入了大学。此外，他也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和批判。在作者的中学时代，他的父亲受过不同寻常的教育，他从学术的立场出发，给他描绘了大学和学者生活的图像，这种图像更多是理想化的而不是现实的，它使作者在前几年就对洪堡的大学观念有所了解。所以在他看来，大学这种机构是这样一种机构，人们在这里应当摆脱一切功利主义的考虑去探求真理，大学除了传授迄今已掌握的科学知识外，对学生的教育应当只在于让他参加对真正的真理的顶礼膜拜。如果在此还能为今后进行某种职业教育，那就更好了。但是，这不是也不应该是大学的基本特色。他认为以下这一点同样也是大学的基本特色，并且可被视为大学兴办得卓有成效的标志，即大学完全应像梵蒂冈那样，一定要在特殊领域有自己的特色。然而现实与理想相去甚远，这使他十分恼怒。至少不仅仅是他这位当时差不多毫无思想准备进入大学的年轻人持有这种观点。这一点很快得到了证实。有一个与他几乎同龄的同行问他,当他走进教学楼时,他是否有一种与人们星期日前往教堂做礼拜时同样的感觉。对此他只能称是。

但涉及到他应当开始上什么课这一问题时，他不像在阅读斯本格勒时那样被弄得不知所措了。他早就知道该从哪儿开始。由于肯定会把印度文明的发展定在希腊文明前 400 年,所以对他来说，首先研究印度哲学的起源是完全不言而喻的。此外，卡尔·海姆著作中的一段话一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在海姆的《未

来的世界图像》第 3 页上的这段话，使他已经了解到“：无论是谁，哪怕他只是短暂地在我们整个西方思想界之外去探求其精神食粮，比方说专心致志地研究吠陀哲学或从古印度的智慧之杯中吸取营养，那么他就知道，在我们西方智慧的彼岸还有一些完全不同的、更为广阔的思想领域。在他看来，从泰勒斯（Thales）到冯特（Wundt），整个一批思想家就像一个休戚相关的小小的思想家家族，虽然从来不乏发生诸如共同挤住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的家庭成员肯定会出现的那种家庭纷争，但是近两千年来却一直共同居住在同一个祖先的房子里，还没觉得有必要对其进行彻底的改建。我们西方思想与印度思想界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我们牢牢地抓住了一些具有奠基意义的区分，这些区分就像不可动摇的基石，从根本上规定了我们世界建构的内在框架”。

于是大学的学习立即开始。他原有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水平很低。现在还要再加上梵文和印度哲学史课程。虽然眼下不应当有印度哲学史课，但是开设了一个介绍律藏(Vinayapetaka)的帕利语讲座为此做准备。然后在下个学期还要开一门古汉语初级课程。这位爱学习的年轻人看不起大学生联合会，因为他们浪费了这么多宝贵的学习时间。因此，第三学期他还要再加上西方哲学的学习。在这里，他发现了西方哲学对精确性的追求，而他迄今还不太清楚，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是不追求精确性的。对他而言，正是这一点使亚洲哲学慢慢变得无足轻重。他渐渐地明白了，只有西方思维的这个特征，才能确保迄今为止的知识水平发展到一个孕育着新思想的未来。在这方面，亚洲哲学望尘莫及。然而，按照理想来衡量，即使是欧洲思维，也远不够精确，因此他的学习越来越转向逻辑学以及与逻辑学相关的形而上学。然而，由于他学习的头几年里逻辑学不景气——他觉得海因里希·迈尔(Heinrich Maier)

讲授的逻辑学课枯燥无味,从哲学上令人失望,因此出于需要而非自己的兴趣，他选修了爱德华·施普朗格( Eduard Spranger )的人文科学课程。起初，他没有预料到这对他而言是何等的幸运。迄今他一直被康德的魅力所折服，他佩服康德比较严谨的方法论，他认为纯粹理性批判是所有一般哲学的顶峰。这个时期，他对黑格尔没什么兴趣。他随意翻阅了黑格尔逻辑学的某些篇章，感到它极其令人费解，而且在这里，他还发现了黑格尔与形式主义进行争论的某些章节。这些文字对他而言犹如亵渎神明，他错误地把他的某些不理解之处转嫁到黑格尔身上。他的判断是多么不成熟！这一点他当时根本就认识不到。

爱德华·施普朗格是一位颇具魅力的大学老师，此刻回想起来，作者不得不承认：是他使作者的思想发展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并给作者指引了一个方向，一个无论作者本人还是他的大学指导教师当时都没有预想到的方向。没有人能像施普朗格那样熟悉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实质并能阐明其在精神史上的意义。在他的讲座中，这位还很不成熟的学生最终理解了，哲学之路不可避免地要超越康德而向前延伸。他还清楚地记得施普朗格在一次研讨会上对客观精神的理论所作的评论，即将来哲学中所有提问都不得不以黑格尔逻辑学为出发点。尽管施普朗格没有谈到形式主义，但此处关于精神科学的逻辑学的绝妙表述已深深地刻在这位学生的心中。

从此，这位学生开始重温黑格尔的讲演录。与这次阅读相比，其他所有的著作很快便黯然失色。首先读《精神现象学》，然后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感谢施普朗格，现在作者能以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研究黑格尔,从此,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展现在作者面前,随着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他第一阶段的学习即将结束。这个阶段的外在成果就是分别发表于 1926 年和 1927 年的两篇小文章，题目分

别是《评东西方精神的结构差异问题》和《个性和宗教史》。①

经过大约一年时间研读黑格尔的讲演录之后，这位现在已不再太年轻的学生明白，从此以后，他必须更多地用黑格尔而非康德的哲学观点来指导他自己的思想和他对问题的探索。研究黑格尔的工作还要以研讨的形式继续许多年。这种形式肯定不符合当代必须在六个学期内结束学习的那种不合理要求。研究的成果就是 1933 年由莱比锡的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 Felix Meiner Verlag )出版的他的第一本书:《黑格尔逻辑学中新的思维理论的基本特征》。关于书名,当时尼古拉·哈特曼( Nicolai Hartmann )问这位即将成为博士学位候选人的学生，书名中的双关语是不是有意而为之，就是说，这里不清楚的是，作者是把他自己的新理论还是把黑格尔的逻辑学理论称做是与迄今为止的传统相对来说新的理论。这个问题使作者很高兴（似乎到目前为止，这个双关语还没有引起任何一个人的注意），他答复说这个双关语是故意用的。他还须补充说，甚至在 44 年以后的今天，他还不能完全把黑格尔对这一理论的影响与他本人的理论清楚地区别开来。

该书的基本论点可以用最简短的措辞概括如下：如果从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唯心主义的逻辑传统出发，以为自己已经拥有人类大脑所能拥有的全部理性，那么它就搞错了；还有更深、更广的理性的维度，它们迄今尚未被发现。应该到德国唯心主义中，尤其是到黑格尔那儿，到他的中介问题中去寻找理性起源。只有这种新的精确的理性被发现之后，黑格尔才能被理解。

① 第一篇文章刊登在《传教知识与宗教学》杂志,1926 年,第 41 卷,第 100- 126 页上。第二篇文章见同一杂志 1927 年第 42 卷第 337 ~ 356 页和第 43 卷第 232 ~ 247 页。

又是几年过去了，作者才开始认识到他与哲学的时代精神是多么不可调和地对立着。这种对立使他离讲坛哲学（Katheder philosophie）越来越远，今天回想起来，他觉得一种非常直线式和合乎逻辑的命运就在于，他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的电机工程系作为生物学计算机逻辑学教授度过了他职业生涯的最后10～11年，直到退休。这些年里，两次有人邀请他重返大学哲学界，他都拒绝了。在这期间，他学会了用典型的美国控制论的立场对待哲学，这种立场使他对那些“不能在可制造的模型中实现的”概念均持一种不可克服的不信任态度。① 而且这里所涉及的是，这种非可制造性必定是一种非常原则的东西。即使在今天，谁崇拜这些方法论的原则，那么他就还是哲学专业领域的一个外行。当然，这是我们对多年之后的事预先作的评论。

首先，这位年轻作者以一种虚假的自信，自以为完全处于当代哲学潮流的范围内，他以为可以确切地认为他本人的活动是围绕着那种哲学研究而进行的，即是围绕着人文科学的逻辑学这个题目进行的哲学研究。最初，即使对他的书缺乏好评，也没有使他担心。虽然也有一些温和的赞赏之词，但是如果真正有一种称得上迄今尚未发现的超古典的理性的话，当时在黑格尔解释方面最有名望的人中，谁也没想到为此而对他自己的黑格尔形象真正提出质疑。而且当作者在很久之后，即在1959年再次在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出版了《非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思想和梗概》第一卷，并在这部关于逻辑学的新著中承认，他即使是在今天其实并不理解黑格尔时，对它的反应可以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概括，即作为个

① W.R. 拜尔：《黑格尔和列宁思想中循环的象征意义》，迈森海姆／格兰，1971年，第32页。

人的自白,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思想和梗概》的作者没有权由于他自己智力上有缺陷而怀疑其他人的理解能力。此外，该书给人造成一个极为方便的借口，即人们不需要认真研究这本书，因为书的前言中已经说了，该书仅仅是一个大部头著作的第一卷而已。不过显而易见，这只能被看做是纯粹的借口，因为比如当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前半部分发表时,没有人想不理睬这部著作。至于《思想和梗概》一书，作者认为这个借口无论如何都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在第一卷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样的哲学立场，即逻辑学需要从其最基本的前提开始进行革新。在这里，已经出现了那种新哲学的概念基础，那种可以讨论，而且正如作者至今仍相信的那样，意味着精神上向超古典理性的突破的新哲学。与之相反，第二卷只起到那种从属的、从技术上实施已经讲过的观念的作用。

还不错，后来在美国，外部的生活环境阻碍了第二卷的最终实施。作者在莱比锡大学当了很短时间的助教，在那里，阿诺尔德盖伦(　　)的那部含意深刻的《意志自由理论》一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他于　　年携妻子(一位犹太妇女)前往南非，在斯泰伦博斯(　　)大学当讲师。从事了两年教学工作之后，他自愿离开了该校，因为他迁居到了美国(　　年他移民美国)。他认为，而且正如后来所证实的那样，他有权认为只有在美国才能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工作。但是，最初外部的生活环境使他打算过学者生活的计划落了空。在美国，他的学术活动首先是从在缅因州的科尔比学院讲授哲学课开始的，不久他就极其讨厌这项工作了，因为人们指望他每周讲　　个课时的课，针对每堂课还要举行研讨。因此当经济上没有出现什么希望，又有别的生活门路时，他就前往麻省的坎布里奇，在那儿，他主要在哈佛大学的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工作,附带在坎布里奇成人教育

中心适当兼点课。

这一时期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但对这位流亡国外、正在寻找新职位的欧洲学者来说并不太幸运。像布吕宁（Brüning)这样的人找工作当然容易。有德国前总理做本学科成员当然不同寻常，但并非所有曾经享有国际声望的人都处于同样有利的地位。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其漫游途中曾经路过此地,他在加拿大一所大学(大概是 Mc Gill 大学)的客座教授职位刚刚结束,他必须谋求一个新的教职。这还是短暂的访问。当然，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无论干什么工作就行。最终，每个人几乎都能找到工作，问题仅仅在于是什么样的工作。这里可以很容易看到如 下一点 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很快地自然而然地适应了美国的大学生活；而那些来自欧洲人文科学传统的学者，尽管他们身在那里，身在最终永久接收他们的那个相关的系里，但骨子里，他们在美国精神生活中始终是陌路人。性格稍稍懦弱，对欧洲流亡者而言具有不可估量的优势。只有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是惟一一位人们不可以背后说他具有这个“优势”的人，他当时就住在离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不远的地方，他从未习惯过美国的大学研究所的生活。对他而言，美国不过是从欧洲开出、最终回到欧洲的那趟列车的一个停车站而已。本文的作者自大学时代早期以来就熟读布洛赫的著作,尤其是那部《空想的精神》。在进一步了解了布洛赫之后,作者对他早就怀有的那种崇敬之情变成了带有某种敬佩的崇拜，这种感情并未因布洛赫与他在哲学领域几乎持完全对立的观点而受到影响。对布洛赫而言，根本不存在什么精确逻辑学。偶尔见个面,海阔天空什么都谈,只是不谈哲学(按照作者理解的那种哲学)今天究竟应做些什么。

最后这句话所涉及的正是作者最终获得的信念，即应当把逻

辑学的哲学革新列入议事日程，而不是像当代数理逻辑努力寻求的那样,仅仅从技术上改进迄今为止的思维习惯。对他而言,只有当他认识到通过向多值逻辑理论的过渡，逻辑学在哲学方面的扩展不得不导致从技术上拓展逻辑计算时，逻辑学才会与数理逻辑有关系。在这方面，自 1920 年以来，已经有了许许多多从数学方面进行的研究。这里我们只想提一下埃米尔·波斯特(Emil Post)和扬·卢卡西维茨(Jan Lukasiewicz)两人。不言而喻,对于向逻辑新领域推进的纯粹技术因素，人们没有理由加以否认。但是关于这种拓展的哲学阐述，人们只能说，即使它不是一点没有，也是完全不充分的。人们竭尽全力试图用古典哲学的手段，即只是在传统世界观的哲学基本框架内去解释某人偶然发现的这些多值公式。关于它的意义，最近还有一位逻辑学家在关于多值性的一篇简论中这样写道：多值逻辑学的意义在于“把纠正措施引入到逻辑理论中来，按照含义区分所使用的逻辑符号并解释新符号”。归根结底,它只不过‘增加了’迄今已被接受的逻辑学的认识价值而已。① 那些迄今为止一直活跃在多值性领域的学者，根本没有想到要对人们迄今所理解的逻辑学的哲学含义进行再思考。

大约在 1945 年,当作者本人开始探讨这个问题时,迄今为止所有的解释都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得出一种全新的答案已是可想而知了。引人注目的是他在修改多值性(Mehrwertigkeit)的一般问题时，某种厌烦就已初露端倪。已经断定，在三值性的情况下，在必须引入三个变量时，排除了对概率或模型论(Modaltheorie)意义上的、与传统逻辑的 16 对函项相对应的函项的数量的说明。这个函项的数量达 27 位值(Wertfolgen),为 7625597484987！在四值

① A.A. 季诺维也夫:《论多值逻辑》,柏林,1968 年,第 118 页。

逻辑的情况下，就更加令人失望，因为现在我们必须考虑 $10^{123}$ 个类似的函项。人们甚至丝毫没有想要发展一种哲学理论，它能够从这么一个大得惊人的数量中按系统学的原理（systematischen Pinzipien）找出任何一个函项并识别它。这里需要一种新的哲学设想，一种以数学为方向的逻辑学家阐释不了的哲学设想。人们可以向逻辑学家们承认，这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然而，这里用纯数学的方法也不可能进展下去了。因此，尤其是在上面所提到的厌烦阐释现象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哲学家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就更为必要。之后不久，J.M. 波亨斯基(Bochenski)这样写道 这些多值体系的逻辑特征很成问题，“多值体系中出现的某些函项似乎不能从逻辑学方面加以阐释，而那些从前热情欢迎这些体系的专业逻辑学家，今天绝大多数对此抱怀疑态度”。① 但是,由于多值体系的结构特征涉及到越来越多的看上去极像人文科学中所谓逻辑的那些问题，因此作者也从这方面出发更深刻地认识到，迫在眉睫的是要对究竟逻辑是什么的问题进行新的哲学分析，幸好他没有预料到他将面临什么以及他在数理逻辑学家们中间会遇到什么样的冷遇，一种即使今天他也没彻底弄明白原因的冷遇。因此他在极其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开始了这项哲学分析工作，直到博林根基金会(die Bollingen Foundation)自 1952 年起为他提供大约九年时间的支持，这种物质条件才有所改善。在此，应再次向博林根基金会当时的副会长恩斯特·布鲁克斯(Ernest Brooks)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他的独具慧眼的理解使得这种坚定不移的支持成为可能。

此外,在这篇自述中不应忘记,作者于 1948 年 4 月加入美国

① J.M. 波亨斯基:《苏俄的辩证唯物主义》,袖珍本,慕尼黑,1956 年,第 132 页。

国籍。虽然早在两年半之前他就可以迈出这一步，但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仍然不理解这个国家的生活节奏，他就不应当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他花了大约七年时间才消除了这种不理解。碰巧有一天他遇到一位美国通，他从这位美国通那儿找到第一把解开美国生活深刻的不同点之谜的钥匙。一本美国科幻小说选落入他的手中，而且幸运的是，这是最好的科幻小说中的一本。他马上认识到，这本科幻小说选完全不同于库尔德·拉斯维茨(Kurd Lasswitz)、汉斯·多米尼克(Hans Dominik)、尤勒斯·凡尔纳(Jules Verne)的某些书籍，也不同于前不久在德国被称为科幻文学的伯恩哈德·凯勒曼(Bernhard Kellermann)的《隧道》。他对结识撰写这些科幻小说的人很感兴趣，而且他很快便成功地与这类文学的名流进行了接触。当时在纽约有很多人定期会面，这些人要么本身就是科幻小说作者，要么就是对这种新型文学感兴趣的人。人们在那儿不仅能遇到文学家，而且还能遇到科学家和工程师，其中的许多入后来都被美国宇航局(NASA)雇用了。除了这种会面之外，作者后来与某些人还保持了进一步的接触。其中有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这位新近改变观念的人于 1952 年在卡尔·劳赫(Karl Rauch)出版社为德国读者出版了阿西莫夫的书《我是机器人》。他与小约翰·W. 坎贝尔(John W. Camphbell jr.)的联系保持了二十多年，后者曾出版一本有影响的科幻杂志——《惊险科幻小说》，此杂志后来被更名为《推理》(Analog)。作者在美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哲学杂志众口一词以某种较为严厉的措词拒绝发表之后，于 1953 年 11 月以《逻辑视差》为题在坎贝尔的杂志上发表的，这对美国哲学界来说是极其罕见的。该题目涉及的是对多值逻辑的一种阐释，它完全彻底地背离了通行的那些阐释。继该文之后，作者在 1954 年的三期杂志上又发表了其他文章，其中作者从逻辑学

家的立场出发研究了星际宇航问题，作者运用多值逻辑的方法分析了空间与时间范畴。坎贝尔和阿西莫夫当时都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家，后者当时还是波士顿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而坎贝尔作为电子工程师，在技术大学担任教授，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对作者而言，正是与科幻文学作品的接触以及坎贝尔对这类文学作品的格外推崇，才使他开始理解美国智慧的特征，而这种理解的第一个萌芽就促使他去获得美国公民权。他从未后悔做出这一决定，更何况他内心对美国气质的肯定很快延伸到了其他领域。但同样，他对很多大学的人文系普遍存在着的那类伪知识分子的反感更大了,他们对欧洲精神的关注——就它超越了历史研究人员必然记载历史事实而言——始终给他留下非常不真实的印象。歌德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市！与歌德完全一样，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德国哲学唯心主义——尽管它在欧洲已经实现，而且对欧洲人而言，它是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也不适合这个新世界。作者在这次回顾中不得不明确地提到，他完全明白，早在 19 世纪中叶之后不久，在密苏里州就有一个黑格尔研究中心，参加这个中心的有一位德国流亡者，名字叫 H. 布罗克迈尔( H. Brokmeyer )。(在该中心之前,还有 1848 ~ 1860 年的俄亥俄州的黑格尔信徒中心,其最有名的人物是 J. B. 斯特洛〔Stallo〕。)加入布罗克迈尔行列的有美国人威廉。托里·哈里斯( William Torrey Harris )和丹顿·J. 斯奈德( J. Snider)。1867 年创刊的《思辨哲学杂志》就是这个小社团的产物。甚至毫无疑问的是，尽管黑格尔的思想几乎没有被理解，但是它对美国的民主实践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还远不止如此。黑格尔找到了一个热情的追随者——沃尔特·惠特曼( Walt Whitman ),他为其诗歌《思想漫游》起的副标题就是《读黑格尔有感》。作者也没有忘记 1877 ~ 1887 年康科德的夏季哲学学校和新